一点山莹照寂寥

——读陈锋著《清代盐政与盐税》

易分田

历史学，似乎由于它过于庄重、过于古奥而渐渐与喧闹的时代拉开了距离。然而，中国毕竟是一个崇视史学并富学术传统的国度，自有其坚贞的学术传人。当人们热衷于无休止的追逐时尚和名利而不能自拔时，甚至在史学界，当一些新潮学人再也无法忍受“乾嘉学派”、“古史辨派”等传统史学的枯燥乏味时，我们不禁为陈锋先生新著《清代盐政与盐税》（中州古籍出版社，1988年版）的面世而倍感欣慰，它恰如一支小小的山莹，给一片冷落寂寥的园地带来了生机。

清代的盐政与盐税，在国家财政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据史载，清代盐税的收入，顺治年间为二百余万两，到嘉庆、道先年间则增至七百余万两，是国家财政中仅次于田赋的第二大收入。鸦片战争后，虽然厘金和关税的收入日渐重要，但盐税收入仍有增天减，光绪末年，每年已达二千四百万两，宣统末年的预算数字，更高达四千五百万两。由此可见盐税收入对有清一代社会经济生活影响之巨。也由此可见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是清史尤其是清代财政史研究的基础之一。毋庸讳言，在建国以来取得长足进展的清史研究领域中，财政史的研究始终可谓薄弱环节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，而盐政史的研究，则更是清代财政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。长期以来，除了若干单篇论文，以及对某些地区如云南、四川等盐务的考察外，尚未有一部系统、全面论述清代盐政史的专著。《清代盐政与盐税》确有填补清史研究空白的开创之功。我们不能不为著者沉寂数年、默默耕耘的艰苦劳作而感动。

然而，感人的精神替代不了严谨的科学。应该说，清代盐政研究的第一大难题，是资料的缺乏。清政府与历代王朝一样，以专卖、重税等理财手段，对食盐生产、贩运、销售加以严格控制。因此，有关盐务的第一手资料如奏疏、盐课奏销册等，多归于档案之中，一直没有公开，致使研究清代盐政的学者，往往因关键资料的缺乏而望洋兴叹。这或许是长期以来盐政史少有人涉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吧。作为一位青年学者，陈锋先生的工作不禁令人担忧。然而，《清代盐政与盐税》以其丰富可靠的史料释去了我们心中的不安。浏览该书，我们发现，其资料来源是极其广泛的。举凡清朝历代实录、盐法志、各省有关通志、清人有关论述、大清会典事例等等，无不加以征引。尤为可贵的是，作者运用了大量的原始档案资料，这从该书的注释中可以获得深刻印象。作者生逢其时，恰遇档案开放，虽属机缘，但作者兢兢业业，为收集资料辛勤批阅、不暇寝食的艰苦情景，仍是可以想见的。

如果说，史资料翔实是该书一大特色的话，那么，对这些史资料所作的科学分析、定量研究便构成该书的又一大特色。近年来的一个可喜现象是，史学界不少学者已认识到定量研究的重要性，只有将艰辛的、细致的数量研究与逻辑的定性研究有机结合起来，才能使自己

的论点明析、准确、具有科学性。然而，这种认识付诸实践则谈何容易，在经济史尤其是盐政史的研究中，其困难程度更不比一般。我们知道，历代盐业，有各处产制海盐、池盐、井盐的地区，称之为产场；有各处销售食盐的分区，称之为引岸；有各种不同的运销制度；有各种盐官盐役的设置，如清代有巡盐御史、盐运使司、库大使、检验大使、盐道、场官以及卡员、巡役、书吏等等；有各种督销的盐引名称，如所谓正引、改引、纲引、余引、陆引、水引以及区别盐斤重量的大引小引；有各种缉私对象；有各种盐税征课名目，如正课、杂课、盐厘、加价以及陋规、公费等等，难以悉数。所以，著名中国经济史学者彭雨新教授无不感慨："论其复杂烦琐非一般人所易详悉，可称之曰'盐糊涂'。"（《清代盐正与盐税·序》）而封建统治者留给我们的史料，也多笼统模糊、零零碎碎。《清代盐政与盐税》的作者没有因窒碍难行，将其视为畏途，而是知难而上，在大量收集资料的基础上，进行了艰苦细致的爬梳、辨析、整理工作，"穷数年之功，几易其稿"，（《后记》）终于写出了这样一部系统全面、有理有据的学术专著。特别是所编制的有关清代盐政的四十八幅图表，更具匠心。这些图表，资料来源广泛、考订精慎，几乎涉及清代盐政史的各个方面，具有很高的学术参考价值，它们与该书文字相互参照，使其立论更加坚实可靠，更加具有科学性。

除上述诸多景观以外，我们还不难发现著者在布局谋篇上的良苦用心。《清代盐政与盐税》不落按年代叙述的编年史的窠臼，而是抓住清代盐政史上的几个重要问题，分门别类，或按年代叙其变异更生，或按种类剖析其内容特点。该书共分六章，即：清初盐业的恢复与盐务的行政管理；盐销区问题；盐课的征收及其在财政中的地位；私盐的泛滥与巡缉；盐商的报效；盐政的改革及其效应。这样，既能提纲挈领、总揽全局，又能洞幽入微、溯源寻源。于是，原本头绪纷繁，错综复杂，时间跨度长达两个半世纪之久的清代盐政史，被著者以脉络清晰，重点突出的二十万言呈献给读者。

诚然，作为一部开创工作，《清代盐政与盐税》还有可商榷的地方，如对盐政与清代政治、经济生活的交互影响，似嫌着墨较少、论叙不足；有些史料分析亦觉不够透彻等等。我们期望陈锋先生不断完善自己的学术研究，更期望严谨、踏实的治学精神不再被那些忸怩作态的惊人之语所替代。